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vast desert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rolling sand dunes with distinct, wavy patterns. In the middle ground, a person is riding a camel. In the far distance, a caravan of several camels is visible on a ridge, with a lone figure walking alongside them. The sky is a pale, hazy blue.

西部拓荒

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回忆录 ②

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协会 编

西部拓荒

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回忆录②

主 编:张柏楷

责任编辑:张 溥 蔺法先 曹 林
郭玉琳 李 笑 宋师孔

准印证号:宁新出管字[2003]第 741 号

西部拓荒

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回忆录②

内部发行
免费交流

准印证号:宁新出管字[2003]第741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K

字数:150千字 印张:7

印数:00001-00650册 2004年1月出版

银川鑫林印刷厂印刷

自治区党委常委
宣传部长 李东东题词

当年西征势若虹
今朝回首气自雄
半生苦战终无憾
字字都在百姓中

贺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回忆录出版

李东东 题

目 录

(以年龄排序)

- 创业艰难话当年.....叶 诚 (1)
一个新闻列兵的回忆.....王永霖 (9)
《一对好婆媳》的风波.....胡传斌 (16)
依窗遐思有天趣.....沙 荻 (20)
采访途中.....李 萌 (25)
永宁县广播站的创建.....陈生玉 (30)
舆论监督感悟二则.....杨玉林 (34)
一封批评信公开发表以后.....蔺法先 (39)
艰苦的岁月 幸福的歌.....陈之兰 (43)
风吹浪打 坚韧不拔.....咸兆瑞 (48)
难忘的一次对外报道.....王洪仙 (53)
岁月随想.....曹 林 (56)
“宁报”此门中 校友长相忆.....毛 弋 (62)
在六盘山上修路.....徐凤亭 (68)
一段艰难创业之路.....秦 炜 (72)
一次不平常的采访.....刘弘毅 (77)
骑行在乡间小路上.....张柏楷 (81)
上山修广播喇叭.....郭玉琳 (85)
非同寻常的 45 天.....李廷凡 (89)
聊以自慰.....白永超 (94)

宁夏电影制片事业的起步与发展···	李庆跃	(100)
半生苦磨砺 书坛盛事多·····	冯天才	(104)
我与宁夏电影发行放映·····	尚同春	(110)
夜宿贺兰山·····	米寿世	(114)
农村采访二十年·····	邹荣顺	(118)
两次难忘的采访·····	石观达	(123)
退休生活琐忆·····	李笑	(128)
报社农场的往事·····	白德英	(135)
难忘的山庄注·····	苗刚	(138)
点点滴滴忆新闻专业·····	王庆同	(142)
在广电系统工作的十年·····	李培植	(148)
岁月风云急 小院故事多·····	张润	(152)
宁夏新闻“两会”成立前后·····	宋师孔	(161)
我与《社会生活》版·····	时茂青	(167)
风雪攀贺兰·····	李乃扬	(170)
花甲之后遂心愿·····	廖开式	(175)
关注新事物 反映新风貌·····	罗大芬	(180)
当了一回大学老师·····	肖鸣	(185)
对银川广电事业的回顾·····	杨松林	(189)
我爱第二故乡宁夏·····	马兰	(195)
坦荡与无愧·····	邸严	(199)
陕甘宁革命老区采访记·····	杨红兵	(204)
《银川晚报》创刊二三事·····	张润年	(209)
编后话·····	张柏楷	(213)

创业艰难话当年

叶 诚



汉族,1918年9月出生於安徽省休宁县五城镇。幼年家贫失学,后经自学粗通文史政治知识。1932年到上海当学徒数年。抗战时于1938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先在基层做政治工作。1945年起做新闻工作,曾任山东《大众日报》、上海《解放日报》、新华社上海分社、《人民铁道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的记者、编辑、主编、总编、主任等。1957年从中共

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二期毕业。1959年调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任台长,后任自治区广电局局长、党委书记,直至1982年离休。

1959年9月,我由北京调来宁夏,出任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据说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自治区主席刘格平到中央要干部,其中包括一名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当时邓小平同志是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他让中宣部指派中央广播事业局(以下称中央广电局)物色人。当时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中央广电局副局长李伍找我谈话,说要我到宁夏工作已是第四位人选了。尽管我感到当时宁夏地处祖国西陲,条件比较艰苦,但为了建设祖国大西北,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行前,我到北京图书馆找了一些有关宁夏历史沿革、地理环境、风土民情的资料,初步了解了宁夏的有关情况。来到银川,当时主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工作的杨辛同志,亲自陪我到文化街5号宁夏人民广播电台。

从此，我把宁夏台当做自己的“家”，一直工作到1982年离休，前后23年。其中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十年以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经受了許多风风雨雨，真是步履艰难。宁夏是我这一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尽管我现已85岁，但对在宁夏艰苦创业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山区未覆盖 电波飞南洋

我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时，目睹当时的工作条件及生活环境，比我想像中的情景还要艰难困苦。电台的办公室是土木构筑的。每年雨季前要用麦草秆和土拌成稠泥浆，在房顶上铺盖一层，以防下雨时房内漏水。电台的唱片、胶带库应当是重要之处，可是下雨时有七八处漏雨，我曾去帮助管库员张尔康用脸盆接雨水，并把唱片、胶带转移到安全的架子上。

发射机可说是广播电台的关键设备。当时只有小小一千瓦的机子，放在西马营（现中山公园）荒丘土坡上的一间小屋内，旁边树立起一根几十米高的木杆当天线。它发出的功率不但南部山区（固原、海原、西吉等地）听不到，就连银川附近的黄河灌区也听不好。

这时，150千瓦的大发射机及机房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中。这是当时省级广播电台统一型号的机子。地点选在银川市西门外良田公社盈南大队，征地一百多亩。当时我曾怀疑征地是否太多，负责筹建的副台长刘亚民是这方面的行家，他认为需要。事后证明深埋地下的网状地线，范围很大，确实需要这么多地。地线上面的表层土地还可以种植农作物，这为以后办农场、度荒年创造了条件，这是始料未及的。

建成发射台是全台一件大事。在财力物力人力都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参加建设的全体人员，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历经一年多才建成。其中一个难题是我去帮助解决的。发射台最重

要的设备，一百多米高的铁架天线，是在北京加工制造的。负责运回银川急等安装的技术员秦炜，因电台未向铁路预订车辆计划，铁路不给运。他跑来向我告急。若等再提要车计划，不知多久时间才可运到。当年铁路是按计划运输的。我就利用曾在铁道部工作过几年的方便条件，跑到运输局局长的办公室死皮赖脸地苦求，才算特批了一辆计划外的平板车把天线运回来。

发射台建成调试机器过程中，较长时间南部山区还是收听不好。没想到突然有一天电台收到南洋华侨的来信，告诉我们收到了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这封信使我们觉得啼笑皆非。因为这与我们的本意相悖。真是“山区未覆盖，电波飞南洋”。我动员参加调试的技术人员迅速扭转这种状况。果然不久，广播覆盖山区的问题解决了。这封华侨来信给我们的调试工作起了参考作用。

办公及住房的解决，也是煞费苦心。最初几年，每年年终前，中央广电局从当年节余的经费中拨出一些钱，支援少数民族地区改善广播事业。给我们一次少则一二十万元，多则三四十万元。我们用这笔钱逐年盖起了唱片、胶带库。原来没有演播室，也盖起了一间演播室，可以制作小型的文艺节目了，还能兼做全台开会的会场。电台附近的惠民巷、光华巷的职工宿舍，也是陆续一幢一幢地小规模改善的。有一次，我听说安玉林同志被房顶落下的土块砸伤了。我就打电话给自治区计划委员会主任夏似萍，激动地说：“区计委从来没有给我们安排过职工住房计划。再不给拨款盖住房，压死人怎么办？大楼可以缓盖，今年一定要给点钱，让我盖点宿舍。”这一年，她在计划外追加预算批给我们三十万元。这就是新市区两排职工宿舍的来源。可见为盖住房要点钱真不容易啊！

广播靠设备 人才是中坚

广播电台没有发射、增音、传音、录音等硬件设备，要把电波传到千家万户，是不可能的。但掌握广播工作的各种熟练人才，又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建台时，由中央广电局调来的刘亚民、藺法先、安玉林、耿长庚、秦炜等行政、技术人员，做了不少建台的开创工作。之后又从安徽等地调来沙获（回族）、孙道珍等同志。特别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宁夏人民广播电台配备了一个近百人的门类齐全的电台工作班子，由陈晓光（后任副台长）率领支援宁夏建台。这批人的到来，才使得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广播电台得以及时开张播音。其中得力的并具有广播工作经验的干部，如徐征、吴文声、张溥、胡传斌、吴恺、朱永敏、谢甲男、达国华、仓凯纳、彭玉真等。从各方面调来的这批干部，他们的政治水平、业务能力很强，敬业守纪，人品素质都是较好的。他们成了宁夏台能够进行正常工作的主要力量。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人手不足的状况日益显露。每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只有一两位，幸好后几年分来了萨本冀、秦加瑄、仝开锦、王建元、徐志健、张梅荣、刘继英等几个人。每年分来宁夏的大学生都先由宁夏日报社挑选；若是一对夫妻，男的给报社，女的给我们。

有一个机会来了。当年上海《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合并，让我去选编采干部，选了沈尔厘、黄道春、郭硕坤等几名。由于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上老弱病残者不适合高原地区工作，故可选者为数不多。

我们为了加快培养本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当时电台只有一人是本地干部），想了一个办法：从当地高中毕业生中选

了雍国权等十名优秀者送往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希望他们毕业后能回到宁夏台来工作。出乎意料的是，这批学生毕业后竟统一分配到北京市的一些工厂。他们热爱广播工作，感到“学非所用”。于是由雍国权牵头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有12名大学生都想来宁夏台工作，是否可以全部接收？这真让我惊喜不迭，又不敢当场拍板同意，我让他下午听回音。放下电话，我立即跑到江云（自治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办公室请示他，并极力主张“全部照收”。江云也爽快地同意了。我们还从来没有一次性补充这么多“新鲜血液”，真像挖到一座“金矿”似地高兴，至今想起这件事还兴奋不已。这批大学生就是雍国权、王淋己、杨发颐、刘忠信、尚玉厚、关德利、潘梦阳、阎毓棠、吕丕业、傅秉江、赵福生等。这些同志以后都成为宁夏广播电视战线上的业务骨干，有的做了副厅长、办公室主任等领导工作。有的工作了三四十年后已光荣退休。

为了彻底改善山区群众收听广播的状况，我们在罗山、彭阳等地建立了转播台。为此又培养了罗廷泉、刘奎山等一批当地青年学生担任技术工作。

宣传为中心 全台齐使劲

广播电台门类繁多，工种迥异，各种人才齐聚一台，谁都认为自己的工作重要。为了团结大家凝聚精力做好工作，我们提出了“以做好广播宣传工作为中心”的口号，即为优质正常播出而服务。此举最初还引起个别行政、技术人员的误会，以为这是为编播人员服务，别的部门工作不重要了。经过教育解释，才统一了认识。当时物质条件很差，比如住房分配，尽量让播出环节密切相关的人员靠近电台居住，以便急需时赶到电台应急；让编采及录音等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忙

碌后，有热菜热饭可吃。很长时期，我们只有一辆客货两用的吉普车，就让紧急采访或录制节目的优先使用，台领导人及其他部门都自觉相让。这些日常工作中的矛盾如果思想不一致，就会出现争端。

说起这辆吉普车，也是得来不易的。宁夏广播电台成立时，中央广电局送来一辆破旧的双门轿车。有一次，我从自治区党委开会回台，司机顾银荣开着这辆车在途中抛锚了，我只得步行回台。从此就把这辆破旧汽车撂在一边无人过问。可巧，有个单位愿用一辆吉普车交换这部汽车，我们当然乐意交换。对我们来说，当年有了这辆吉普车就得力多了，实用多了。好几年就是靠这部车解决了许多交通运输难题。

以搞好广播宣传为中心，大家都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加班加点是常事，夜间办公室灯光通明。我常常见到吴文声、张溥等在精编稿件。不少同志没日没夜地以台为家，全部心力都扑在工作上。节假日，我们工作更忙。我是吃住在台内，要审改全部播出稿件，夜间仍在工作。有时天刚亮就有行政采购人员来敲门，因为当时规定，两千元以上用款要我签支。

对编、采、通、播工作人员，提高业务水平也是贯穿在以宣传为中心的重要环节。编辑部经常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国情、区情、社情（公社、生产队等），总结工作经验，评选优秀稿件。文艺节目也是精编细做，并与文艺团体保持良好关系。出外采访的记者，定期集中总结工作，整顿作风纪律，不允许记者利用方便条件私自采购土特产商品。为了提高播出质量及减少差错，我还重视监听工作，除在办公室开着收音机监听外，还用半导体收音机随身收听。这个举措，悄无声息地引起大家重视提高播出质量，防止差错。有的播音员（直播时）走出播音室，见到我的眼神就知道他播得优劣如何、有无差错。目

光严肃示意比开口批评更见效，脸带笑意赞许也比浮面表扬更使人心甜意暖。

说起监听，我倒想起一件往事：有一天刚上班，马玉槐（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立即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劈头就问：“叶诚，你怎么搞的？”我问是什么事？他说早上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结束时播出的“国歌音乐”为什么不播完就隐去了？我对他说，我们接到中央台紧急通知，说《人民日报》有重要社论一定要在第二次“报摘”节目中完整转播。为了怕漏播，只得如此。另外，隐去国歌音乐的段落是常有的事，比如欢迎外国元首的庄严场面，不是常常播出国歌音乐的一个段落吗？听了我的解释，他才“哦”了一声，让我退出。我走在回台的路路上想，领导也重视监听是好事。

由于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认认真真工作，注意提高质量，每年送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向全国各台交换的文艺节目，数量和质量都算较好的。

红枣治浮肿 菜多当街卖

1960年到1962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我到宁夏不久的遭遇。宁夏全区人民过着“低标准、瓜菜代”的日子。全国又实行了精简城市人口的政策，我台各部门的人员被精简到120人，多一个也不允许。台内职工的口粮定量由三四十斤压缩到24斤。因营养缺乏，职工中不久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员，患上不同程度的浮肿病。我心急如焚，就向中央广电局讨来四只淘汰废弃的汽车轮胎（生产队的马拉大车还可使用），通过记者萨本冀向社队换来二千斤红枣，全部交给职工食堂。每天煮红枣粥，蒸红枣馍，供应职工，增加营养。经过一段时间食用，大家的浮肿病逐渐好转。我又派吴恺等同志下厨房帮助出主意、

想办法，会同食堂炊事员采用粗粮细做等办法制做“康复饼”等，让大家吃得可口，有利于消化吸收。

当时自治区各机关都办农场，生产瓜菜来度荒年。电台也利用发射台深埋地线的表面土层种植瓜菜，办起农场。除种植粮菜之外，还养猪、养鱼、养鸡鸭等。农场只有少数管理人员，大量农活还是电台职工轮流下去耕作。由于大家发扬“南泥湾”精神，加上土地肥沃、黄河水灌溉，农场连年丰收。黄瓜能长到一米长，我从未见过，水分也足。我们生产的东西，主要供给食堂做菜让职工食用。以后生产的黄瓜、西红柿等一时吃不了，就在电台门前卖给周围居民分享。有一次，我听说办公室副主任蔺法先拉着一架子车瓜菜上街叫卖，我赶快派人把他叫回来。当时不准开放“自由市场”，我怕犯错误受批评。

在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建台五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用自己农场生产的鸡鸭鱼肉蛋和蔬菜，举办了一次庆祝宴会。全台同志欢聚一堂，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欢庆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经过创业的年月，度过了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



叶诚在上海安度幸福晚年。

一个新闻列兵的回忆

王永霖



中共党员。汉族。原名王方杰，王伯瑞，1926年1月出生于四川乐山牛华溪镇。1949年在重庆任中国职业青年社《职业青年》记者。建国前后任新华社冀鲁豫分社、平原省分社、华北总分社和总社记者、编辑。1957年任《光明日报》记者。1961年调来宁夏后在自治区交通局工作。1984年归队在宁夏日报社任编辑，并评为主任编辑。1987年2月离休。

我是个一生跟党走的新闻列兵，走过这段漫漫长路，历经了几许铭记不忘的风霜……

1938年至1939年，我在四川省乐山县五通桥通材中学读书。受学校地下党特支抗日宣传和阶级启蒙教育的影响，我积极参加了下乡讲演、办墙报等活动。1943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长诗《流水》。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跟共产党走。

1945年3月，我与《新华日报》青年生活编辑刘光联系好去中原解放区，因三斗坪方面道路被封锁，便一等再等。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经何子超介绍，1946年我在重庆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进步团体——中国职业青年社，任《职业青年》月刊记者。职青社的主要活动是，以办报刊团结教育更多的青年，并组织青年群众投入反蒋反美斗争。

国共和谈期间，我与许多进步记者交上了朋友，常同他

们一起跑新闻，在多次集会上，见到过中共代表团和民盟代表团的成员以及无党派社会贤达人士，听过他们的政治演讲。在另一些招待会或联谊会上，还和他们交谈或请教各种问题。是年二三月间，按照《职业青年》主编沙扬（何子超）的嘱咐，募集了些出版资金，《职业青年》月刊第一期于3月出版，我陆续发表了一些民主人士的专访和撰写的社会问题文章。我也逐渐认识和倾向于反内战求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

自从1946年2月10日震惊全国的较场口暴行事件后，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图谋急速达到全面性的规模，内战烽烟四起，各地镇压人民的事件不断发生，暗杀民主人士、残害工人、逮捕学生，封禁报刊和殴打记者等层出不穷，我和职青社几位同志曾多次在《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声援抗议。职青社还和近20个社团发起隆重举行了6千多人的悼念李公朴、闻一多遇难的大会。1947年2月，新华日报社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并限令撤离重庆。3月，职青社也因遭到侵扰、监视和跟踪，又传闻当局将有大批逮捕行动，便宣布暂停活动。据说，我已上了黑名单，组织上劝我暂避一时。于是，我和在沪、港的朋友联系，假托回乐山故乡探亲，悄然离渝东下上海。

我到上海投奔的是原《征信新闻》同事黄宇乾。他时任《上海商报》记者，兼任银行通讯社记者。本来有个朋友肖明已同上海大公报采访主任谈妥我去当记者，待到我去面谈时，显然他对我穿的破西装看不顺眼，饭碗也就吹了。恰好黄宇乾与朋友筹划编印《1948年中国贸易年鉴》一书，我就参加进去，弄点钱糊口而已。后来，我的《征信新闻》旧同事、忘年交黄启昌为我联系去苏北解放区，大功将成，忽然接到我成都师范的老同学、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曾白融来信催我速去，说他已为我接洽好了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关系。

1948年8月我到了北平，在与地下党组织接头时，恰和

两年前曾在重庆一起战斗过的《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意外相逢。按照他们几人的安排，我便经天津到唐官屯，通过封锁线顺利到达泊镇。在泊镇接待处住了两三天，依嘱更改了名字后，便乘大马车去正定，在华北大学一部学习。此时东北大捷，各战场也捷报频传，同学们不断为人民的胜利热烈欢呼。一次因敌军偷袭石家庄，我们向邢台转移，夜行几天后半途折返正定。在乡村黑夜行军，白天驻村睡觉，我眼见了亲切的军民鱼水情，见到乡村干部同人民群众平等友爱的情景，对比蒋管区，解放区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不禁对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倍加拥戴。回到正定，听钱俊瑞教务长作行军总结报告，那真是一堂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列课。对行军中许多违纪事件，教务长风趣地一件件精微剖析，指出其个人主义表现的思想根源，使大家在阵阵哄笑中欣然认错。自己也有这些思想烙印，第一次认识到需要思想改造。

1948年年底，华北大学准备进入北平，我们举行了结业典礼。我被分配到冀鲁豫行政区工作。1949年元月，我来到冀鲁豫首府菏泽，在冀鲁豫日报社报到，此时报社内部正在抽调人员组建新华社冀鲁豫分社，由尹承伊负责，分配我做编采工作。所编采稿件多在《冀鲁豫日报》上刊登，向总社发稿极少。后来，冀鲁豫行政区调整了部分专县辖区建立了平原省，省会设在新乡市。我们也从菏泽迁入新乡，成立了新华社平原省分社，由尹承伊负责，又调来一批精兵强将，人员增至十余名，挂牌自立门户，为执行将新华社建成消息总汇的目标而扩展工作。1952年春，我被任命为城市组组长，与两位来自华北革大的同志一起，担负财经工商及政治时事等报道任务。同年8月，调华北总分社作记者。1953年4月，又调到新华社总社地方新闻部当编辑。